

揚子前經

校聞

尊

特阿爾著
石梅林譯

慧星書社出版社

揚 手 票 前 線

譯林 梅石 盡著 麗特阿 ✓

慧 星 書 舊 社 印 行

1 9 4 0



蔣夫人簽名贈給本書著者的照片



蔣總裁

序

本書並不想要對於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機構作一種適當的分析，也不打算敘述中國的經濟問題。我在中國的時間太短，戰爭的恐怖太近，要冷靜地診察中國的疾病是不行的。我祇是竭力如實地寫出我在中國所親歷的事實；使別人能够看見遠東正在演着的悲劇。

本書將要表明中國的戰時生活並不全是可悲可怕的，却也有可喜可賀的方面。中國人的鎮靜和滑稽，中國人的和藹可親，以及他們的聽天安命的哲學態度，全都傳染了戰地記者『漢口幫』的各個份子——我在他們之中生活了幾個月，和他們同到中國前線去，和他們『用談話熬着太陽』過了中國的長夏。

注意於歐洲的糾紛，畏懼着將來的西方戰禍，我們都不大留心遠東戰鼓的喧騰，但是四萬萬中國人的命運對於將來的歷史家却是二十世紀初葉最重大的事件。古希臘各邦祇顧到民主的雅典與法西斯原型的斯巴達之間的衝突。牠們忘却了羅馬和加太基的興盛，而後兩者的鬥爭終於決定了地中海各國的命運。現世界的前途的決定或許在於揚子江與黃河一帶，而不在於萊因與維斯杜拉之間，或歐洲的那些會議廳裏吧。

現存的最悠久的文化，一切文化中最和平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正在抵抗着兇暴的『東洋倭寇』——曾經從西方學得近代戰爭技術，而拋棄了我們西方的政治觀念和我們戰爭時用以減輕殘酷的那種人道主義。（下略——譯者。）

兩年以來中國繼續抗戰——武器不良，屢次失策，不但受着原始經濟的阻礙，而且受制於剛纔創立的近代政治和近代社會組織的幼稚機構。凡是看見過戰爭中的中國的人誰都不能懷疑中國復興的確實性，雖然過於樂觀是近於愚昧的，但是仍然可以相信日本到底不能征服她。現在中國人民的痛苦是超於我們想像以上的，所以需要鼓勵他們繼續忍耐下去。

在本書裏我大膽批評中國。不論我怎樣渴望着她的勝利，我還能够看見她的缺點，我曾經驚怖於人民大眾的被漠視，尤其是傷兵的被漠視；我強烈地感覺到掩飾中國的弱點，或裝作過分樂觀，都不是我對她應該做的事。中國將要戰勝，無論日本軍備怎樣優越，祇要那些古老的積弊，那些世代相傳的社會的和財政的暴虐，以及那些陳腐的思想方法和行政方法讓路給適合於少年中國的精神的種種改革。

凡是在中國住過而且被中國人當作朋友的人們，不愛他們和不稱讚他們的是很少有的。在中國我也明白了一個友好的外國人的批評並不能比價於中國最優良的男女的批評——他們爲了他們所信的正在戰爭劇痛中創造着的新中國獻出全部能力，而且他們的多數曾經爲此犧牲性命。

凡是仔細讀過美國獨立戰爭史的人都能够記得當時的議會怎樣無能，借戰爭發財的人們怎樣貪污，軍隊和民團的武裝及給養怎樣缺乏，戰爭怎樣幾乎失敗，以及怎樣幾乎屈服於外國統治之下。當時主戰的人們的精神終於克服了這一切困難，中國也能够得到同樣結果的。

蔣介石將軍正是和華盛頓一樣偉大的人物，中國的游擊隊並不劣於新英格蘭的民團，而且中國的團結比十八世紀美國十三州的聯合更為鞏固。

我感謝去年我所交往的許多中國朋友，他們使我懂得他們的國家的問題，並且使我領會那些為救國而工作和戰鬥的人們的忠誠。

我也感謝本書中所說的那些美國『棒子』，他們長久住在中國，會說中國話，不顧戰線和空襲的危險，不惜引起日本的仇視，盡量暴露日本在中國的暴行給西方的太過『馬虎』的公衆。

我，一個外行的戰地通信員，從這些人得到了援助，友情，以及正視悲慘景象的勇氣。

最後，我要誌謝鮑夏德先生（Mr. Walter Bosshard），美國海軍卡爾遜上尉（Captain Evans Carlson），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斯蒂爾先生（Mr. A. T. Steele），路透社的斯密斯先生（Mr. Leslie Smith），因為他們允許我把他們在中國前線或漢口所攝的照片翻印在這裏。

『今晚，那些餓着的兵士唱歌了，然後走到鋪在泥地上的穀草的床上；他們的歌唱我覺得比往常更有意義。在夜間他們的聲音好像一個大樂隊的合奏。我今天吃飽了，覺得我絕不能夠充分明瞭中國解放鬥爭的精神——這是深藏在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心底裏的。我還是一個旁觀者，而且處於特權的地位。這些人餓着而我常有食物。這些人凍着而我常有衣服被蓋。他們將要戰鬥，他們將要倒臥在冰凍的疆場上。我將要是一個旁觀者。現在我看着他們混合在街市的黑暗之中；他們還唱歌咧。因此我渴望有一種靈光使我能够看見他們的心理，照明他們對於他們不但獻出生命的那偉大鬥爭的種種信念。』

(參看本書二一〇頁)

目 次

序

第一章	天堂與煉獄	一
第二章	武漢三鎮	二七
第三章	初次由漢口到前線	七八
第四章	中國紅十字軍醫處	一一四
第五章	再到揚子前線	一五〇
第六章	陷落之前的漢口	一八三
第七章	中國會不會戰勝？	二二〇
第八章	日本侵華的目的	二三九

插圖目錄

蔣夫人簽名贈給本書著者的照片	目次前	李漢魂將軍，著者及路透社記者斯密士	101	前
蔣總裁	同上	李漢魂將軍及奪獲之日本軍械	同上	上
香港的難童	3頁前	大治的模範戰地醫院	同上	上
被日機炸毀的廣州街市	同上	布朗博士在山西與八路軍同行	133	前
被日機炸死的廣州兒童	同上	農民替八路軍運送傷兵	同上	上
漢口女童子軍維持遭日機炸毀之災場秩序	39	著者在農舍外洗臉	157	前
母親痛哭被日機炸死的幼兒	同上	在前線患瘡疾的兵士們	同上	上
被日機炸死的嬰兒	同上	陽新附近中國紅十字會的道旁救護站	同上	上
從被日機炸毀的家室中逃出的人民(漢口)	43	瑞昌西部前線的兵士及裝運小鋼砲的馬匹	165	前
日機燃燒彈所焚毀的家宅	同上	在日機轟炸中暫息於山下的兵士	同上	上
中國紅十字會醫務委員會主任林可勝博士	同上	湯恩伯將軍	同上	上
待渡的中國兵士	89	離前線一哩半的鄉村中的兒童	同上	上
已渡的中國兵士	同上	史沫德萊女士	219	前
在收容站中之傷兵	同上	蔣夫人在漢口醫院看護傷兵	同上	上
在紅十字會救護車中的重傷兵士	同上			

第一章 天堂與煉獄

一 香 港

經過了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三星期太陽下的那種閑散生活之後，我在一個七月的清晨到達了香港。在我告別英倫的時候，我早就害怕等不到我抵達漢口，也許漢口就已經失陷了吧，而這種急迫的感覺使我在這一個可愛都市中多耽擱幾天研究研究所謂『香港心理』這念頭也受了阻遏。不消說，即使我在那裏僅作短期的勾留，也已儘够使我相信現在在香港的英國人所表現的老『上海心理』比在上海表現得更厲害。香港的存在，以及香港白種黃種居民的生活，雖則有賴於中國的勝利，然而許許多英國人仍然把中國看作十年前的中國，害怕着中國的民族主義，比害怕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厲害，甚至香港的英藉中國財主認購一九一四年歐戰時期的公債，也比這一次慷慨得多。

一九三八年的香港，是世界最繁榮的都市之一。原來，自一九三七年秋天上海淪陷以來，它就成為對華貿易的主要商港了，這是除開在華的日本貿易而說的；它也是吸收中國流動資本的一塊磁石，香港雖是中

國的一部份，同時却是英國皇家的殖民地，它固然受戰事的影響，却並不在戰事的範圍以內。香港發了戰爭的財，它不比中國的各城市用不着就心日軍的炸彈或炮艦。很顯然的，它的生命綫是廣州和中國內地，一旦在政治上和地理上被切斷了的話，香港便必然變成東方的維也納——一個失了營養的機構。香港畢竟不同於上海，在上海，日軍的存在，日人的狂妄和傲慢，永遠使在華『白種人』認清了：如果日本戰勝中國，白種人將陷於怎樣一個可怕的局面，而香港却是巧妙地脫離着戰爭。英國人在這裏繼續過着他們在東方所過慣了的舒服而又享福的生活，至於中國的財主，則好像洪流一樣匯聚在酒樓和咖啡店裏，誇示着他們的富足，恬然不以為恥。香港更拒設難民收容所以援救從廣州逃難出來的貧苦無告的人們，而且，從星加坡或荷屬東印度華僑那裏為中國募集捐款，也比在香港募集容易得多。

在香港，另一種形式的難民也很多，並不是那向着中國內地作長途跋涉的或鰲集在未淪陷的中國各城市的挨餓，櫛裸，而慘苦的羣衆；也不是那露宿在上海街頭而至於慢慢倒斃者每天竟達數百人之多的絕望的男女和孩子。香港難民大部份是有吃，有穿的，算得是小康的，這些都是離開廣州來逃避長期空襲的人家；有些是帶了他們的資金從別一些城市來的，不顧戰局的結果如何，只想保持他們的財富；有些則是廣州和漢口的政府官員的妻子和兒子就在這裏，以保安全。除了最熱心愛國的份子以外，任何人只是要力所能及，大抵都已避來香港，或至少已經把他們的眷屬送到香港來了。中國的匯劃統制是有的，從理論上說，是不

可能容許這麼多的『國幣』流入香港的。一方面，事實上，中國的公務人員，能保持廉潔的本來就很難得，同時，還有一種困難，就是中國土地上的外國租界的存在和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地位。倘沒有外國銀行的澈底合作，中國資金的實際統制是不可能的。在此刻，香港屬於英國，故已處於戰區以外，說這是有裨於中國，固然是事實；可是由於它的存在，正如由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一樣，反使有錢的中國人逃避了中國捐稅，而且把他們的財富輸出到中國以外去了。

香港物價一天天的騰漲，營業一天天的繁盛；各家旅館都擠滿了旅客，房價增加了一倍。無論咖啡店，酒樓，或商舖，也都擠滿了主顧。中國的各個城市正在戰亂之中流血，香港却肥胖起來了。

這畢竟是一種變態的繁榮。日軍隨時有進攻廣州的可能，有把香港跟它的財富來源切斷的可能。人們也發生着這樣的疑慮：難道日軍不會攻取香港嗎？英國會不會決心保衛香港呢？無論日軍採取那一種行動方式，那是明白得好象牆上的告示似的事，而香港的歡樂，終究是帶些兒肺癆症的興奮。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九龍成爲了世界上最擁擠的商埠。九龍是中國大陸上與香港相對的『租借地』，在這裏通着五百五十英里長的鐵路線，經廣州而達漢口。我所搭的那艘德國船，開始以最高的速率卸下德國售與中國的軍火，然後又駛到神戶去卸下售與日本的軍火，在德國船的傍邊，有一隻意大利商船，也正在卸下軍用品。英國船，法國船，蘇聯船，美國船，都停泊在九龍埠頭附近。中國從各國購入的軍火都由此運到長

沙或漢口去。沿鐵路線一帶，雖說每天都遭到日機的轟炸，然而日本並不會達到破壞目的。中國正利用着它戰前在海外所儲存着的外匯和白銀準備，並大量輸出茶葉、桐油、錳、鎂、鈷及其他物品，以作支付的新代價。中國深知日軍隨時都有襲攻廣州並進佔漢口的企圖，因此它正在熱烈地盡量佈置着軍事上的準備。所以到了十月間，雖然漢口和廣州都被侵略者奪取了，可是中國政界方面依然聲稱：當時中國的軍火準備，還足以能够繼續供給軍事上的需要，甚至可以支持九個月之久。

這些車火的運卸，並不嚴守什麼秘密。這是不必要的，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而且是屬於英國的。誰都可以隨意出入於龐大的船埠上，看着苦力們背負着重重的箱子，流着汗，或者在水閘旁邊打瞌睡，留心着搬運貨物。我見過一艘掛英國旗的船隻，船上的大副是英國人，船主人是寓居香港的幾個法國尼姑，船長是美國人，而工程師和二副則是日本人，這艘船從蘇聯國境敖得薩地方載來了一批軍火。這種情形，可說是航運事業——或者也可說是軍火事業——上的『國際主義』吧。據說，在香港，不售與中日任何一方的唯一軍火商，就只有捷克的司科達（Skoda）公司。在香港是難於保持『爲民主而戰』的幻想的。倒是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目前已經絕跡了的戰後文學作品中的警告，那些作品指出了一邊人們爲着理想或意識而戰鬥，同時，在另一邊，世界軍備競爭的陰謀又是怎樣地煽動着戰爭和戰爭的謠諑。後來，我又聽得一個在華的法國的大儒主義的老神父說：中日戰事將要持續到英法美三國所希冀的使中日雙方必須就範的日子。

典型的香港外國人既不理解中國所受的苦難，也不能容忍新中國或中國民族復興等等形勢的出現。到處是誹謗和輕蔑，說中國官員是如何如何的貪財。他們只看見舊中國的個人主義和任用私人的積習，不願看見新中國正在砲火中壯大起來。今日的中國，正像一隻脫毛換皮的動物，舊的皮毛雖然還有不少的殘留，可是人們如果再湊近去一瞧，便可瞧見新的皮毛是正在那裏生長了。

再者，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忘掉各國在戰時都有靠戰爭發財的人，同時又忘掉英國的更隱秘的更紳士化的腐敗方式。日本的腐敗狀態，是每一個閱讀日本報紙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日本的歷史更顯示了明治維新時代中高級官吏和將領的腐敗。

香港的不幸是在這裏所能看見的不過是戰時中國的壞的方面。這裏是一切不知愛國的富翁的薈萃之區，這裏又是軍火販賣者和購買者會晤的地方。他們看不見中國人的戰鬥，也感不到中國的精神。即使他們看見或是感覺着了，那也不過喚起了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回憶，他們曾經在那個時期反帝浪潮面前，爲着他們自身的生存而發抖，或爲着他們的利潤而戰慄。此後三個半月，當我前往觀察上海時，我會因英國人態度不同而大吃一驚。因爲在上海，中國的新的質素已經逐漸顯露；在上海，英國軍官也歌頌着八百孤軍的壯烈和中國士兵的英勇；他們所有的武器既不精良，而又在大不利的條件之下作戰，但是他們竟能堅持抵抗日軍，達四個月之久。在上海，也已經難得有人存着『日本一旦戰勝中國時還能容許英美繼續經營

對華貿易』的幻想。

香港有許多很有趣的人物可以去訪問。孫中山先生的寡妻同時是蔣介石夫人之姊的宋慶齡；她的弟弟，即最幹練最有名的銀行界首腦宋子文；還有那多年來亡命巴黎最近纔回國而又爲右派所不容的陳友仁，他在港滬各報攻擊蔣的政策，期待着或至少是希望着他會被召回復職。

陳友仁這個名字，在過去，是英國人最畏懼最懷恨的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那是當陳任外交部長的時候，他代表中國要求把漢口租界交還中國——民國十六年簽訂的中英協定。現在，他寓居九龍的一個小小的屋子裏，不爲英國所重視，也不爲中國所信賴。從英國人的目光看來，他彷彿是國民黨革命時期中最不妥協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他的名字，使英國人不免回想到從前的事，以爲蠻視英國而又侵襲英國帝國主義利益的乃是中國而不是日本。

我發見陳友仁是一個最激刺的談話者和銳利的觀察者和思想者。他也許是富於野心的吧，但是在顯要的人物之中，究竟誰是沒有野心呢？無疑的，他瞭解西歐及其種種政策，非一般中國人所能及。他和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一樣，主張與蘇聯密切合作，可是他並不是對蘇聯有什麼幻想。現在，他更主張跟英國攜手，爲的是中英利益一致。他是現實主義者，不是理想主義者。也許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並不爲中國人民所愛戴。另一個原因，是在於他一向生長於西印度，不懂中國話，無論對於中國和中國的思想方法，都似乎陌生得像

一個外國人一樣，不足以瞭解本國的人民。

我兩次訪問陳友仁於九龍郊外的小住宅內，談也談得很久，他反覆地強調着說，中國缺乏軍械製造廠是現勢中應注意的主要的着眼點。他說：

『中國並不能單獨獲得勝利，中國正需要聯盟。我們不但應該建立一個軍事陣線，同時也得建立一個外交陣線才好……日本正在對我們發動全體性的戰爭，所以我們的抗戰也應該是全體性的。……

『在一九三二年，日本還不會建立現代化的空軍。那時，我們早就有了創造空軍力量的機會。不幸，中國雖然募集了航空捐款，但當此次戰事爆發時，我們所有的飛機還只有一五八架至一六七架光景呢。……

『再其次，就是德國顧問問題。當時，德國派他們來華，是認為蔣介石的歷史任務，乃在於掃除殘餘的軍閥，使中國一變而為推銷德國商品的廣大市場。自希特勒執政以來，蔣介石的「任務」也變了，變為反對蘇聯了。德國趁此把武力的援助，軍事的設備，以及軍事顧問，盡量供給中國，因為里賓特洛甫認為使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妥協，組成反蘇集團，是可能的事。實際上他却沒有認清楚這一政策的矛盾性。此次抗戰以來，進展至今，更顯示了不可避免的現實，於是緊隨着希特勒在去年（一九三八）一月間的演說，德國便召回了他們的顧問。希特勒十分明白：他到底是失掉中國這一市場的好呢，還是失掉日本那一個軍事同盟的好呢。德國的經濟利益，終於爲着它的政治利益而犧牲掉了。